



北京元代文学

◎傅秋爽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北京元代文学

◎ 傅秋爽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一个最重要的转折时期。本书深入广泛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对北京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剖析,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对北京作家的创作土壤、创作心态、创作成果进行考察分析。力图全面描述北京元代文学的发展概貌,展示北京元代作家作品的杰出成就,深入研究其产生、发展、繁荣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责任编辑:赵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元代文学/傅秋爽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130-0492-3

I. ①北… II. ①傅…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北京市—元代 IV. ①I20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017 号

北京元代文学

BEIJING YUANDAI WENXUE

傅秋爽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7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16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字 数:32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邮箱:zhaojun@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0.5

印 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ISBN 978-7-5130-0492-3/I·141(339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一

元代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分水岭，是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走向由“雅”而“俗”革命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变化，既由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同时与元代北京生活的全面催生密不可分。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使得北京幸运地成为杂剧、散曲为代表的新兴俗文学的肇源地、核心聚集区和全国辐射源。北京，作为新兴文学全盛时期的中心，见证了这场历史性转变的全过程，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影响其未来整体走势的轴心，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北京文学完成了从中国文学发展的部分剪影转而成为完整缩影的历史性的转变，实现了从被影响到全面、强力、大范围释放影响，从被辐射到发挥全国性辐射作用的实质性飞跃，从较为单向的被他化逐渐完善、强化了化他的诸项功能。元代北京文学，在北京文化发展历史中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此前，对北京而言，秦文、汉赋、唐诗、宋词的耀眼光芒只是或多或少投射进来的几缕阳光而已，作家少，影响小，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辉煌自元代始，自杂剧、散曲始。同时，诗文的创作也呈现出有别于前朝后世和其他区域的独立个性。这些，既是北京已然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标志，也是这个中心建立的雄厚根基。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其对北京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元日之前，无论是辽之南京，还是金之中都，尽管北京已登上国家首都舞台，但是其各项功能并不完备、成熟。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成为国家首善之区，承担起引领国家文化的历史重任是从元开始。文学在此中，因其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具有举足轻重功不可没的作用和地位。



厘清北京元代文学发展脉络，具有双重的意义。只有透彻地了解元代文学尤其是时代文学代表杂剧、散曲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才有可能对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规律、发展走向做出更科学、深刻的判断。只有清晰地剖析元代北京文学兴盛的真实环境和深层原因，透彻地理解北京文学在元代大都成为当时东西方最为著名的世界城市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才能使得古代文学的研究对今日北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产生正确的引导作用，才能对今日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提供充分历史依据和准确的借鉴。

尽管北京元代文学具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对其研究有如此重要的多重意义和价值，但是现实的学术研究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改革开放 33 年间，全国各地对于地域文学的研究都极为重视，并取得长足的发展。据我院张泉研究员调查统计，在内地 31 个省、区、直辖市中，除吉林、安徽、海南、青海外，其余 27 个区域（省）均出版了多种通史、断代史或分体史。其中，完整的省市文学通史，即纵贯古今、横兼诸体的，有八部：《湖南文学史》、《巴蜀文学史稿》、《黑龙江文学通史（4 卷）》、《山东文学通史（古代卷、20 世纪卷）》、《陕西文学史稿》、《辽宁文学史（上、下册）》、《江西文学史》、《上海文学通史（上、下册）》。^①北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的城市史，近千年的建都史，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发展贯穿始终，从未间断，且自元开始极为发达，文学诸体发展完备，文学遗存甚为丰厚。但是，北京在全国的地域文学研究中并没有起到相应的引领、示范作用，甚至在不少领域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在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北京文学史》出版之前，北京甚至没有一本哪怕是简要的、能够贯通古今、诸体兼备的地域文学史。这与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极不相称，与其为北京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极不相称。这种令人深感遗憾的落后与空白，有其客观原因。以北京地域文学的古代部分为例，其历史长，体式多，作家众，文化现象纷纭复杂，史料庞杂浩瀚，在系统整理和甄别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实在是一个投入巨大、费力耗时而又难以短时见到突出成效的艰巨工程，难免令人望而却步。

^① 张泉：《概述》，引自傅秋爽主编《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而且在讲求速度、效益，追求短平快，以量化作为考量标准的时代，进行这样一项静心冷板凳的工作，的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个工作对于北京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是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所以，在《北京文学史》对北京文学进行了简要的勾勒之后，对辽金北京成为国家首都之后的元、明、清各个时代的文学分别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描绘和分析，成为北京地域文学深入研究的重要步骤。《北京元代文学》在此背景之下，作为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重点项目得以立项，的确反映了院领导和院学术委员会专家以及通讯评审专家们基于对北京文化发展的深刻见解所达成的共识。

二

北京元代文学时间上的涵盖范围。以“大元”（简称“元”）作为国号，是公元1271年确定的。在此以前，这个政权称为“大蒙古国”。元代是历史上统治中国时间较短的王朝，如果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开始算起，到元惠宗（即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朝攻下大都，蒙古皇室北迁，统一的元王朝宣告灭亡为止，时间仅为九十七年。如果从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南宋王室灭亡，元朝统一全国算起，则时间更短，只有九十二年。而在习惯上，人们从未将元代的起讫时间等同于元王朝的起讫时间。一般都是将元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从蒙古王朝灭亡金朝（1234）统一北方算起，这样元朝的国运稍长，共计一百三十四年。也有的将时间推得更早一些，明初官修《元史》，就把元朝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到元惠宗退出中原期间统称元朝。明清人研究元代文学，基本上始于金亡，大蒙古国统一北方，迄于明王朝的建立，约定俗成。即：“从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中国，以元为名，从金国末期到元亡，南宋后期包括在内”^① 现当代人所著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延续了前人的惯例，将元代文学的起讫时间一般都是定为蒙古

^① 金克木：《元代的辉煌》，载《中华读书报》1994年11月28日。



王朝灭金统一到元王朝灭亡，即1234年至1368年。由于时称燕京的北京是较早进入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区域，甚至要早于元灭金的时间（1234），所以北京元代文学的起点应起始于元太祖十年（1215）蒙古铁军攻占金中都，实际占领燕京，到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同年八月明军大将徐达攻入元大都，元残余势力北逃大漠止，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五十余年。实际上，从蒙古政权将金驱逐，实际控制燕京地区，到忽必烈称元并将燕京确定为国家首都正式改称大都，中间相隔几十年。这几十年中，并无“元代”之称。但为论述方便，也为避免造成行文前后时代、地域称谓产生混乱，故将此阶段通称为“元代”。这与所有中国文学史论著中有关元代文学的起讫时间并非就是元王朝的起讫时间的通例是相一致的。即使是元人，他们所言“国初混一”，也并非全部都是专指蒙古政权统一南北方，有时也指蒙古政权统一北方，以此作为改朝换代的标志。所以，本书这样的时间划分实际上是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和长久的历史依据的。

北京元代文学的空间涵盖范围。北京是个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历史上的称谓非常多，燕、蓟、幽、燕京、南京、燕山、中都这些名字都曾使用过。本书中所谓的北京，大体遵循北京在元代行政辖区的划分和历史上的“燕京”所辖的沿革习惯。元代，除了闻名世界的称为“汗八里”的大都城之外，大都路下辖的十州之中还有七州全部或部分也都在今北京境内，即：通州所领的潞县和三河县北部、灤州之武清县北部、涿州之房山县、蓟州之平谷县、龙庆州（今北京延庆）之东部、顺州（今顺义）及檀州（今密云）。实际上晚至公元1272年，元统治者才正式定都北京，才有了“大都”之称谓。但为了历史性的空间概念的前后一致，以上地域不仅统统纳入北京元代文学论及的空间范围，且为论述方便，避免概念混乱，皆笼统地以“大都”或者“北京”名之，有时则以“燕京”称之，且三者之间常常交替使用，虽然三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内涵有相当大的区别，但在本书的论述中皆名有异而实为一，即皆以今日北京的空间范围和历史文化地域相结合通而论之。其实当时绝无“北京”之称，且可能亦并不始终以“大都”名之，读者对此不可不察。

三

本书在论述架构上，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上编中除了对元代社会背景、大都文化特征以及元代文学地位、大都文学概况进行描述之外，按照文学体式不同对北京文学分别进行勾勒与分析。元代处在文学的转型期，传统诗、词、文与新兴文学体式戏曲、散曲、话本小说并存。在论述顺序上，因其对于元代北京文化意义轻重之略有差异，故与一般传统文学史先诗文，后小说、再戏曲略有不同，并将统称为元曲的杂剧和散曲这两种联系紧密，但实为不同文学体式的类别分而论之，先杂剧，后散曲，最后诗文。这不仅是因为杂剧乃元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戏曲史的第一个高峰，开启了中国俗文学大行天下，与正统文学双峰并峙的历史，而且在于散曲、杂剧肇源并成熟于北京，大盛于北京，并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和进程，成为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分水岭。同时，元杂剧奠定了北京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大都因为杂剧和散曲的高度发展和繁荣，开启了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辉煌历史，开启了北京文学的高度就是中国文学高度的历史。与此同时，元代北京诗文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集中体现了北京文学的首都特色、创新变革特色。所谓首都特色，是指文坛的包容性——集中了当时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各种创作流派，汇集了国内最主要的文学思潮；文坛的广泛性——作者来自全国各地，从馆阁高官，文坛领袖，到平民士子、宗教人士、少数民族作家无所不包；文坛的高度——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文学领军人物、代表人物，往往聚集北京，并借助这里的文坛得以名扬天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北京文学的创新变革特色，主要是指所有聚集于当时北京文坛的外来作家们，都既是影响者，又是受影响者，他们的创作题材、风格、审美取向各不相同，带有文化原生地的烙印，来到大都之后，都受其影响而有所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



盛于宋的词创作，在元代并未中断其脉络，元成为承上启下接通宋词和清词两座高峰的桥梁。但是，在大都文坛，词的创作毕竟属于边缘化的非主流文体，从作家人数、作品数量、艺术成就、风格多样性以及领军大家是否出现等标准衡量，其成就都无法与元曲和诗文相提并论。所以，本书词并不单列章节，只是词的创作随作家在不同章节进行补充性的介绍。元代白话通俗小说与杂剧、散曲一样，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题材。它的出现，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且具标志性的事件。话本大盛于宋，元代继续流行。文学史上，历来宋元话本并称，实际上宋讲小说流行，元则讲史更为常见。关于话本创作的史料留下的非常少，大都话本创作搬演情况更是不得而知。但是，从几点可以推断，当时大都一定是话本极为兴盛之地。第一，这里有最为庞大的市民阶层，他们生活富足而闲暇，重视娱乐享受，有需求就会有生产；第二，这里有最优秀的说唱艺术家，可以将此艺术发挥到较高水平。从《青楼集》中对说话人情况的记载，可知这一行当内已经涌现出不少非常优秀的专业艺人，他们多为女性，所说多为讲史性质；第三，这里有最集中、最优秀、数量最多的杂剧文学创作者，许多作家在创作杂剧的同时，也进行话本的创作，或者将题材转与专门的话本写作者，以实现其最大价值。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些说书话本的创作者难以准确地判定其籍贯以及创作的具体地点，所以作为地域文学史的《北京元代文学》为学术严谨起见，不进行专门章节的描述。

上编中，以章为基本单位，根据各种文学体式内容的多寡，每种体式划分为若干的章，章下分节。章与章之间的先后顺序，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节与节之间的次序排列也大致遵循此规律，但均不机械地、严格地照此标准执行。如，元代杂剧，作家的生卒年代很难确认，所以无论是章还是节，先后顺序并不一定非常严格反映作家的生卒年代或创作时间的先后。但是创作期的先后次序是不能颠倒的。一般来说，重点作家专节论述，如杂剧中的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散曲中的刘秉忠、关汉卿、贯云石等都属此类。同时，倾向于将家族作家放置在同一章节中，如，商道、商挺、商琥、商琦家族作家就被放置在同一节中，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刘秉忠、刘秉恕兄弟，赵孟頫、管道昇夫妇，宋本、宋褰兄弟等都被分别放在同节中论述。但更普

遍的是将同时代的、身份相同、地位相近，或者是创作题材、风格类似，或者艺术成就、个人影响力相当的作家放在同一节中。在元代汉文学创作中，华化的西域作家成批崛起，并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生力军，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所言：“元名臣文士，如廉希宪、贯云石，畏兀儿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人也；颜宗道，哈拉鲁氏人也；赡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这些最著名望的华化作家中，有相当多地定居大都，也有一些因为仕宦原因生活在大都，他们的创作，“各呈才华，标奇竞秀”，为元代北京文坛增添了瑰丽奇特的光彩。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示这些作家创作的整体风貌，尽量将他们集中在同一章节中，如第十四章大都诗文（五）中的第一节、第二节，就集中了高克恭、廉惇、廉惠山海牙、丁文苑、萨都刺、马祖常、迺贤、拔实、辛文房、伯笃鲁丁、答失蛮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

在每一种文学体式最前面，分别用两节的篇幅介绍该种文学体式在元代北京的发展概况和发展分期。由于杂剧、散曲、诗文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兴盛时期的前后时间交错，因而它们在发展分期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间节点上也有较大的不同。大都诗文在发展过程和阶段划分上呈现出与杂剧和散曲不尽相同的面貌，这是因为杂剧和散曲作为一种“时尚”艺术，具有非常显著的流行文化特征，兴起、繁荣、衰退的轨迹非常明显，潮起潮落之间落差很大。繁荣之时，轰轰烈烈，人们趋之若鹜；倏然南去，则骤然寂静，唯留下余音袅袅。所以《青楼集》描述说遥想元曲当年盛况，竟然有恍然如梦之感。元代最主要、在大都发展最充分的三种文学样式，杂剧最繁荣红火，鼎盛之时，影响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其他文学样式难以匹敌。可惜时间长度上，最短；作家以绝对数量论，最少。而且并无社会身份地位显赫的文臣士子染指，大都杂剧在大德之后迅速沉寂。相反，大都的诗文从来没有像杂剧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却贯穿了整个蒙元政权统治的始终，大都馆阁之士，隐逸之徒，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多参与其中。前期创作较少，但是也有创作个性突出的堪称优秀的作家；中期人才济济，大家迭出，群星灿烂，一派繁荣；后期风格多样，



个性凸显。整个发展轨迹非常清晰，均衡有序。介于诗文和杂剧之间的是散曲，在大都文坛活跃的时间比杂剧要长，创作者比杂剧要广泛，无论是诗文作家还是杂剧作家，都有散曲创作，但是相互之间楚河汉界，互不关涉，作品风格也个性鲜明，面貌迥异。但是与诗文创作相比，散曲的活跃时间又稍短，创作者并没有像诗文那样能够贯穿整个元代始终。这种差异和不同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存在，因为任何文学体式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有各自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反映了各种文学体式发展的不同特征，而各种文学体式的发展、成熟和衰落，在全国不同地域，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步特性。有的地域是发源地，有的地域得风气之先，而有的地域则通过变异改革，产生新的流变。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北京元代文学中各种文学体式的分期与中国文学史各种文学体式的分期是有较大差异的。例如，在诸多种类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中，中国元代杂剧的具体分期方法略有不同，但是其鼎盛时期所指的时段大致还是一致的，而这一时期却正是《北京元代文学》中北京元代杂剧发展的全过程。而《北京元代文学》为了更好地描述元杂剧在北京这个地域的发展脉络，就要对这个时期重新进行客观的分期论述。而北京元代诗文的发展，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元代诗文的基本风貌，是全国诗文发展的一个缩影。因为对元代不同时期诗文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除了元初一些具有强烈遗民情结的诗文作家之外，大多都集中在京师，或者曾经到达京师并借力大都文坛平台，展现才华、释放影响。

下编的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部分，将关注点聚焦于文学的时代代表和大都文学最辉煌的成就杂剧和散曲。基本以章为单位，每个中心议题为一章。章内内容的分节，则不在总目录中显示。

四

有关作家及作品的人选条件及其标准。首先要包括的是北京作家。所谓北京作家，本书是指：出生在北京，此后仍长期在北京或离开北京的北京籍

作家。任何地域文学研究，对于本土作家都极为重视，《北京元代文学》也不例外，凡生于斯，长于斯，创作于斯的作家必选。因为这部分作家是个具有标志性的指标，他们的多寡，成就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既能反映出文化发展繁荣的程度，也能够标示出该地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劣。影响这个环境的因素非常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交错复杂。它们包括了该地社会生活的安宁与动荡，政治生活的清明与昏暗，物质生活的富足与匮乏，历史文化遗存和影响正负双面影响，宗教、教育、文化水平的高低以及思想、文化活跃程度等等。这些因素对文学人才的成长和成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元曲尤其是杂剧发展繁荣，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据王国维对《录鬼簿》所录元杂剧发展前期或曰鼎盛期的五十七名最优秀的剧作家分析，其中近半数生活并创作在大都。围绕在大都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这些杂剧领军人物周围，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杂剧作家和最优秀的杂剧艺术表演家。他们是庾天锡、王仲文、杨显之、纪君祥、费君祥、费唐臣、张国宾、石子章、李宽甫、梁进之、孙仲章、赵明道、李子中、李时中等，这些土著的杂剧作家无疑是重点论述的对象。在大都散曲的发展过程中，这批人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创作更具有自然潇洒的韵致，本色、天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肇源地散曲原生态的风貌。诗文作家何失、张进中等也属此类。对这些作家的生平和主要的创作成就，都进行比较全面的描述。他们之中的少部分人，后来离开大都，如关汉卿、马致远就曾远赴杭州，但因其一生主要生活在大都，烙刻着不可磨灭的大都文化烙印，他们会用大都人的眼光看待异地的一切。所以，对他们在异地的创作情况也会进行简单扼要地介绍。

有些作家，籍贯北京，或本身生于北京，在这里有着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后来因仕宦或其他种种原因，曾经离开。由于他们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故乡的生活曾给予他们不可磨灭的影响和记忆，所以，这些作家同样入选，对其创作选取与大都相关部分进行论述。贯云石属于此类，宋本、宋褰兄弟也属于此类。这里并不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论述，而是侧重介绍他们在北京的文学活动，侧重他们作品中涉及北京印象、北京情感的那一部分，侧重他们所具有的大都特色对迁居地创作的影响。同属这类作家中有些



人，文学成就虽然很高，但是最辉煌的创作也许并不产生于北京，但是鉴于他们的重要影响和在文坛的地位，所以也会录入。耶律楚材最辉煌的文学成就产生于随成吉思汗西征途中，这部分作品虽与大都无涉，但是其在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由此确立，并且此后耶律楚材基本生活在北京，他对北京文坛的影响力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选入并进行了重点论述。北京自元代开始，才形成了独特、完备、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文学，才具有了从体式到内容、风格全面创新，独立发展，引领全国文化的能力。北京文学如此地位的确立，正是以上作家功绩所在。

如果说以上作家更多体现的是北京地域文学的本土特色。那么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创作者共同铸就的辉煌，则更多体现了北京文学的首都特色。与中国其他地域或地区文学不同的是，北京自辽、金确立为王朝都城，到元代更一举成为统一国家首都，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荟萃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不同身份地位作家最为广泛的文坛。其文学在表现地域特色的同时，便具备了鲜明、浓重的首都特征。所谓首都特征，其表现是：活跃于京师文坛的作家来自不同地区、地域，他们前来的原因不同，身份有别，民族、宗教、信仰、文化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驻留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在此所产生的影响大小各异。虽然他们各自携带不同文化因子而来，曾经的文学创作留有各呈异彩的历史印痕，但受到京师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新的风貌，他们的创作是北京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描述北京元代文学时，与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必须充分凸显北京这一特征，要彰显出北京文坛对于那些非北京籍作家的容纳、吸引、推崇、褒奖、扬誉，要彰显这些作家对北京文坛的贡献。因为他们原籍虽非北京，但在北京的生活，却成为其一生中重要的创作阶段。而北京元代文坛，缺少了他们，则会失去大半的光彩。因而这些非北京籍作家同样是《北京元代文学》描述的重点。一般来说，具体的描述上这个重点是有选择性的，集中在他们有关北京生活时期的历史和创作。

还有少数的作家，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使之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对新政权的态度，个人的

身份和政治立场，诗词文创作的内容与风格，都对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和文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而，作为特例，也将其收入《北京元代文学》，这就是张弘范和文天祥等。还有一些作家，或者是旅途经过北京，或者是与北京友人唱和，或者是思慕北京，或者是追忆北京，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终其一生从未到过北京，但由于其作品出色地描绘了北京，热情讴歌了北京，为北京元代文学保留了最珍贵的史料，在北京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特定的影响，所以也纳入《北京元代文学》描述范畴。钟嗣成作《录鬼簿》，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及所作元曲作家吊词，夏庭芝《青楼集》，都因为出色地记录了元代大都杂剧、散曲创作而对北京元代文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杨朝英和周德清。前者因《阳春白雪》《太平乐府》而使得北京元散曲得以保存；后者因为《中原音韵》对元曲的创作、传承、传播都起到重要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总之，北京籍贯的，在北京生活的，描述讴歌北京的，与北京文学发展相关的都全部纳入《北京元代文学》的范畴。

元代，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之后，回到威尼斯，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当时称为“汗八里”的北京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情景。在此，我们仅将其作视作游记性质的史料加以引用，并不作为专门的文学作品给予全面评述。

五

在地域文学或区域文学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局限是，仅仅划定了某个特定的空间，将研究对象从中国文学的大版图转向某一地域或区域的小版图，范围更小更具体而已。而研究方法思路却没有改变，依然沿用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如此，中国文学发展史成为地域或区域文学发展史的广阔背景，地域或区域文学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节选本、删节本、



增补本。地域或区域文学研究的所有论据仿佛都是为了重复性地佐证中国文学史已有的研究结论，仿佛不如此不正统，不如此不主流。在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地域或区域，各种文学体式的发展均显示出不均衡的常态，每种文学体式创作在全国著名的作家也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文学各种体式发展的连续性不强，时断时续。所以这个“节选本”、“删节本”、“增补本”与全国文学史的重合度可能并不太高。而对于北京文学史而言，情况则要严重得多，尤其是自元代开始，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文学的发展，不仅各种体式发展较为均衡，而且文脉昌盛，延绵不断。北京的文坛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和他们的代表，北京文坛的各种文学思潮，成为全国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北京文学研究如果不能彻底冲破一般地域文学或区域文学研究的误区和局限，不能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进行革命性的突破和创新，那么北京文学史无疑将会彻底地沦落为全国文学史的“拷贝”、“翻版”，对北京元代文学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元代的北京文学，就代表了中国元代文学的最高水准，北京元代文学的作家，就是中国元代文学的领军。中国元杂剧四大家有三个在北京，元曲最著名的作家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元代诗文中，元代文学的奠基者在北京，代表最高成就的四大家也都长期生活创作在北京。所以，只有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开辟全新的道路，《北京元代文学》才能避免走入与《中国文学史》元代篇章高度重合的泥潭，这是北京古代地域文学研究的难点所在，恐怕也是多少年来北京古代文学史研究始终处于空白的重要原因所在。

《北京元代文学》追求探索未知领域，进行知识领域的重新构建与拓展。以北京这样一个在整个中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地位极其特殊的城市，在其文学断代史研究中，应该展现更高的学术品质。

《北京元代文学》首要的任务当然还是要完整地描绘北京元代文学真实面貌。只是，这个真实面貌不是对《中国文学史》有关段落的重复翻拍，或者是剪贴帮补，而是要将北京元代文学的本相视为是一个具备完整文化基因的，有机的，成长力、活动力极强的充满活力的完整生命体展示出来。

无疑，那些在《中国文学史》元代篇章中的属于北京文学论述范围的作家，

肯定依然是《北京元代文学》论述的重点，不应该有所遗漏。这是由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享有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他们在北京文坛上所享有的地位决定的。但是在对其描述时，如果简单重复《中国文学史》已有的结论将失去地域文学研究的意义。因而要凸显其独特的个性风貌，要凸显他们与北京社会生活和北京文坛的血脉联系，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因为所有的共性必然通过个性来体现。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本身就是由众多的地域或区域文学共同组成的。同样，地域文学或区域文学，也是由一个个有着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个体组成的，是由一篇篇穿越历史充满人文生命力的作品构成的。每一颗生命之树，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有萌芽、成长、成熟、繁盛、硕果累累、衰微老去的生命历程，都要经历冲破沙砾，战胜苦寒，经历风雨，享受阳光雨露的特殊环境，每一片文学森林的长成、壮大或者衰败，必定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生态。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决定了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决定了由作家创作组成的地域文坛上是布满了针叶林、阔叶林、灌木丛抑或是荒漠戈壁，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还是肃杀沉寂、鬼影蹁跹。《北京元代文学》就是要通过描述元代北京伟大作家的长成及其成就，观测土壤，观测气候，观测日照，观测温差，追寻文学发展繁荣的内在动因及其客观规律。

剖析代表性的个体是必要的，因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要用无数个独立的个性存在来证明、推断理念的共性，而不应该相反，用宽泛的共性遮蔽个性。那么什么是个性呢？关汉卿的狂放潇洒，王实甫的绵密华美，马致远的典雅清丽都是史有定论的创作个性。但是，我们要追寻他们的生态环境，在他们所生活的大都，统治政策如何，观众构成怎样，经济条件、生活基础、文化环境又是什么情景？我们发现，统治阶级对文化钳制的松懈，整个社会思想的宽容开放，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解体与重构，文化产品商业化的迅猛发展，大都市民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杂剧观众较高的欣赏水平和文化素养，加上作家本身更为开阔的生活视野，更为多元的生活道路选择，作家和艺妓更加密切的关系，作家之间行业内的更紧密的合作等等，共同成就了北京杂剧发展的辉煌年代，成就了整整一代杂剧作家和艺术家茂盛成长的黄金岁月。大都杂剧作家的文化生态环境，通过与周



边地域文化环境的比较得以凸显；通过大都作家南移杭州之后，杂剧创作事业归于沉寂得以凸显；也通过河北真定、山东东平、山西平阳几个北方杂剧发展地域中心的映衬得以凸显。这些都是北京作为全国杂剧中心的研究价值所在，也是《北京元代文学》要充分挖掘的真实面貌。

入选《中国文学史》的名作家要选，名篇章有些也要选。这些名篇同样也存在重新解读与全新视角的问题。例如，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至今仍然常演不衰的《赵氏孤儿》，其核心主旨是宣扬“诚信”与“报仇”，它的社会文化根基在哪里？“诚信”和“报仇”历来是社会下层民众最信奉的道德律条。而在燕赵之地，苦寒的自然环境，残酷的掠夺战争，频繁的统治更迭，动荡的社会生活，都促成了此地尚侠好义的地域民风，自古以来，荆轲、高渐离、樊於期、田光、燕太子丹等慷慨赴死之士的大义和气节就成为燕赵人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他们的“士为知己者死”“一诺千金”，这些民间道德价值观念都有着非常久远深厚的文化根源和极为广泛的民众思想基础。因而，《赵氏孤儿》的诞生，与大都民众多尊崇行侠仗义之士，勇于慷慨赴死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是人民心声的表现。懂得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发生在元代本朝的河北义士王著刺杀祸国殃民的国家奸相阿合马，然后从容就擒慷慨赴死的壮举了；也就不难理解著名诗人王恽秉笔直书，作七言古诗《义侠行》为其树碑立传热情讴歌了。当然该剧产生还有另外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自赵宋政权建立后，无论是北宋末还是南宋，国家始终面临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与辽、金、元战争不断。软弱无助的皇族赵氏，危急时刻，曾给程婴、公孙杵臼这些保全赵氏血脉香火的历史人物追封尊号，建庙祭祀，表彰忠义，以期借古还魂，逃脱彻底覆亡的命运。虽然宿命难改，但却也在客观上扩大了这些历史人物在民众间的广泛影响。这些文化层面的深层挖掘，使得同一个作家相同的作品在《北京元代文学》中有了不同于中国文学史的解读和视角。

解读与视角很重要，选择同样也很重要。这包含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作家的选择。阚举、员炎、何失、张进中、吴元德在《中国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但在大都诗坛他们却是特立独行的一方代表，因而他们成为